

想起端木蕻良

孙郁

汪曾祺生前不太看得起同代人的一些文章，但对于端木蕻良却另眼相待。有一次我到他家去送信，不知怎么说起端木蕻良，他以为这位老同事出笔不凡，是个懂文章之道的人。举的例子是，几年前香港一家文学杂志搞创刊纪念活动，两人都写了祝贺文章。刊物出来后，汪曾祺觉得还是端木蕻良高明，句子是脱俗的。说这话时，他的眼睛是亮的，就笔墨趣味来说，他们彼此有相通的地方。

端木蕻良大汪曾祺八岁，算是前辈，但彼此距离很近。他晚年体弱多病，几乎不参加文坛的活动，也由此，看不到躁气，能够静下心来写别人没有的文字。较之先前的写作，他的风格略变，不复小说《科尔沁草原》的纵横酣畅的笔法，带出几分沉静感。词语有些幽远之意，章法则有明清笔记之味。他放弃了现实题材的写作，转而研究《红楼梦》，潜心创作长篇小说《曹雪芹》。创作之余，偶作散文随笔，学识、趣味水乳交融，有不小的气象在。从众多文章看，学问家的意味渐多，喜欢访古，浏览杂书，在古今文脉里往返，词章就别具一番味道了。

他和北京文联的许多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，五十年代，就与老舍造访过西山，调查过清代旗人遗迹。他参加过京郊的土改，还在首钢体验过生活，写过厂史。许多年间，赴远郊参观农林业，勘察古物，所写文章厚重、朴实，有不少卓识在。因为又喜欢戏剧，对于绘画与书法也有心得，文章就多了士林之风。他的丰富经历，也带了审美的繁复性，敢于去写《曹雪芹》这样的书，需要大的雄心和气魄。林斤澜先生有一次

对我说，端木蕻良写《曹雪芹》，是无米之炊，难度过大。言外是失多得的，敬重之余，有点惋惜。

端木蕻良对于北京历史与民风十分留意，他在报刊上的文章，短小多趣，像《香山碧云寺漫记》《关于“黄叶村”》《北京是我的一本大书》等，对于古人诗文与历史形迹的点染，漫出诗意，理解之同情中，也有拷问在，一些地方继承了周氏兄弟传统。笔触自如散淡，把玩古物中，又不卖弄学识，谦逊之情扑面而来。我总觉得他与汪曾祺的文章有许多默契的地方，那文风是否影响了汪氏，也未可知。不过他后来没有汪曾祺影响大，可能是陷在“红学”里，拘于一处，触觉有些拘谨，整体来看，旨趣略显单一了。

不知为何，一些研究散文史的人，不太注意他，这有点遗憾。若说北京文坛文风的转变，他是代表人物之一。许多短文的题旨都不是宏大叙事，也无时代的流行意识。像《山胡桃》《云杉》《化为桃林》《黎明的眼睛》都属于小感觉的流淌。但有时候也能感受到对于历史沧桑的体味，再如《东不压桥胡同，你在哪里》《我与“文协”》，生命的浩叹中，有远去云烟的卷动。善于抓住瞬间的感觉，将目光投射到悠远之地。年轻时的写作关注现实生态，晚年则带出思想的纵深感。他早年在清华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，这种求变的选择，说不定与史学意识有关吧。

从左翼队伍过来的作家，能够在文体上自觉求变的，端木蕻良大概是代表人物。沉澱的经验在他那为与古人对话的资源，所以无论是谈王夫之、戴震、曹雪芹，都左右可进，上下来得。《大

观园和伊甸园》言及“桃花源”与《圣经》，就把审美之图扩大了。《红楼梦》里的“空”和“无”里的佛、道、希腊诗文的联想、感叹，是思想与诗意的盘旋，回味的空间变得辽阔。他自觉地意识到文体的价值，人无法摆脱前人的影响，词章的选择也无时不在一个古老的文脉上。他多次与友人说，“唐诗晋字汉文章”才最为重要，这是章太炎与鲁迅启发的结果。他在《笔谈随笔》一文中推崇《梦溪笔谈》《酉阳杂俎》、鲁迅杂文，其实也道出自己写作的文脉参照。那么说来，在周氏兄弟之间，他更接近鲁迅遗风的。

也由于此，端木蕻良的随笔依旧不忘旧念。他对于流行的文化持一种警惕态度，那些花里胡哨的艺术与文风，在他眼里不过短命所在。《赤子泪成虹》礼赞了现实感的诗歌；《警惕历史重演》说到德国光头党，提醒人们注意法西斯主义复苏；《窗外一瞥》《鸡年“斗鸡”》都触景生情，有逆俗之语的闪动。他的文章并无火气，但慢条斯理中，对于文风的弱化持批评态度。在一些看似闲谈的文字间，能够聆听到思想的碰撞。不妨说，在汪曾祺、张中行被人关注前，其作品已开新风，若说新京派的散文能够壮大起来，端木蕻良也有一份功绩的。

多年前读他的怀旧怀人的文字，很喜欢。1981年，鲁迅诞辰百年时，他写的《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》，就饶有趣味。后来所写《茅盾和我》中的见识和情怀，也自有别人不及之处。他的叙述语态自然而带文气，起伏间有点民国时期文人的博雅，但又自然平淡，毫不夸饰，这也是汪曾祺佩服他的

原因。他笔下的老舍、郑振铎、胡风、尹瘦石都传神得很。看得出，虽然是左翼出身，审美方面却带有包容性，对于历史人物和不同流派的艺术，高则仰之，善则随之，文章也就放得开，收得拢，富有弹性。这与他的低调生活有关，虽然人脉甚广，却甘于寂寞，入世而不享世，在纷乱中能安之若素。这一点，他与孙犁略有一点相似。

我多次去端木蕻良在和平门的那个新家取稿，他一直在病中，不太见客。每次都是他夫人钟耀群接待，稿子也是钟老师重抄过的。记得最初的联系是在1992年底，我打电话给他，希望能给《北京日报》新创办的副刊《流杯亭》写点什么。不几日，便得到他的那篇《戏说“流杯亭”》，文章洋洋洒洒，古而含今，从兰亭的“曲水流觞”谈到故宫里的“覆赏亭”，还有中南海的“流水音”，最后写到1957年于中山公园废弃的石头堆边的一次经历，他发现了丢失很久的文物“兰亭八柱”，并给《文物》杂志写下《兰亭八柱有下落》的文章。此文与副刊风格特别契合，掌故与见识都有，读之古风习习。那时候能够讲清国内的“流杯亭”分布情况的人不多，他的学识也让报社的同人佩服不已。先生纵笔春秋，谈山水文，文字沉静，对于魏晋风度的追怀中，自己的真性情也流淌出来。《流杯亭》的作者也算人才济济，而他与汪曾祺的短章在那时最灵矣妙矣。

现在想来，年轻时对于他们两位，解之不多，如今重读他们的作品，快慰之余，依然纵笔春秋，谈山水文，文字沉静，对于魏晋风度的追怀中，自己的真性情也流淌出来。《流杯亭》的作者也算人才济济，而他与汪曾祺的短章在那时最灵矣妙矣。

给黎明写着信

苦痛的现场

连芷平

这个夏季里最炎热的几天，我本计划自驾穿越黔东南，到云贵交界去。不想，我住进了医院，开启一场迥然不同的“沉浸式避暑”。

头几天清晨，喊醒我的总是护士女孩：“19床，抽血了哦！”每天抽一次血，为的是看看我的血红蛋白有没有新的变化——最低的时候，它只剩下59g/L，是正常人的一半，到了需要输血的程度。这很令我吃惊，死亡竟能“突然地”离得这么近，近到颠覆我的认知：原来并不需要绝症和车祸，一个人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

再后来，每天喊醒我的人变成了隔壁的18床。我的命运可谓坎坷，三十八岁就查出了癌症，动了大手术切除了那个患癌的器官，没几年又复发了，转移到了另一个部位，这一波住院，是为了做六次化疗。我听了都替她觉得痛，说：你真是受罪了！而她却说，自己其实想放弃治疗，但是丈夫不肯，因为两个孩子还小。18床长着一副健壮的体格，和一张带着笑意的脸，这让我觉得她有一种令人钦佩的乐观，但她却说：我是没办法，活一天算一天。

18床每天早上天一亮就爬起来。她来自远郊的乡村，平时在家，这是她种菜浇水的劳动时节。她起了床喜欢坐在我床头那把扶手椅上，跟我唠嗑起来。

她有无限的话题：“你的枕头不是医院里的？”她把我吵醒了，但我拿出耐心，闭着眼含糊地答：“是从家里带的。”“你的洞洞鞋好穿吗？”“不好穿，平时放在车上，顺便拿上来的。”“你竟然带了电吹风？”“没有，昨天晚上想洗头，叫外卖买的。”“你住个院带这么多件衣服？”“嗯……”聊着聊着，我重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她也毫不在意。

18床很关注她的住院费用，每天都要反复地逐条确认护士送来的医疗单据。化疗折磨她的身体，但费用折磨她的神经，一看完单据，她就情绪激动，如果看到一条她认为没有做过的治疗也列在了上面，她就会费力地跟护士争辩。

我深深地理解这焦虑，虽然18床也可以报销一部分医药费，但治疗一回要花掉十几万，而且是举债的结果。她说钱是弟弟主动借的，家里的积蓄已经在上一次治疗中花光了。

那些天，我躺在床上，常常思考一个问题：生病，究竟是身体的事，还是情感的事？我想，表面上看起来，生病接受治疗，这是身体的事。但在治疗中，它就越来越变成关乎情感的事。

一天早上，18床说她再也咽不下那些淡口味的鸡蛋豆浆，想吃麻辣烫。她

丈夫跑到医院外面的街上买了一碗麻辣烫上来（大清早的麻辣烫，想必也不好买），18床刚吃两口，就碰到医生来查房。医者仁心，医生自然都希望患者早日康复，但这位医生尽管也是兢兢业业的专业人士，嘴上却很不留情，对18床高声呵斥起来：“不能吃了！快丢掉！听到没有！跟你说了要吃营养餐，你吃这个！你身体受不了的知不知道？”

18床诺诺地应着，求饶似的说：“我是真的吃不下那些没味道的了……”医生没理她，呵斥完了，走了。18床没动筷子，她的丈夫也久久沉默着，连靠背椅都没发出一贯的吱呀作响。

我和18床之间隔着一方布帘，我也在沉默，我为她的际遇感到痛苦，此刻，病房变成了一个“困顿时空”。我想，18床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待多久呢？一碗麻辣烫给予一个人的精神慰藉，相比“没给营养”，孰轻孰重？医生的呵斥固然很正确，但这呵斥增加了病人的精神负担，让大家心情抑郁，再严重一点，还可能让18床又一次想放弃治疗……我不禁思考，苦痛的现场除了医疗的存在，是否还应有其它柔软的东西……比如，人文关怀的“人驻”？

在我动手术时，一群女医生和女助手们告诉麻药尚未退去的我，说手术很顺利，切除的组织第二天便会送去活检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充满了感动，暗暗感慨道，妇科无疑是当代社会中的一种“女性同盟”，一群优秀的妇科医生，其发挥的意义恐怕要胜过当下的一场女性主义行动。

但我躺在病房里，察觉到的却是，在专业领域的分工细化之下，人文精神实际上是被医疗体系排除在外缘的。接受治疗的病人，比如18床和我，我们身上的痛苦能够得到治疗，但精神上的痛苦却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，甚至，正是治疗我们身体的医生，无形中在增加我们的精神痛苦。病房，是一个尚未被人文关怀照亮的地方。

比如，当我询问医生，我打的这种副作用较大的针剂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，医生冷漠地回答：“有啊，切除器官！”当我问她能否开一些消炎药给我，因为手术时用了导尿管，我感到有些不适。医生却训斥我：“就叫你要多冲洗你不冲洗！”导尿管造成的感染恐怕很常见，而此，则变成是我（不由分说就被认定的）“遭遇”，加上不听医嘱的后果。

住院，即是我们必须暂时离开自己的生活空间——离开一种惯常的保护状态。因而，我与18床同病相怜，双双体会到人们常说的“生病就没有了尊严”。我有时不禁悲观地觉得，住进病房的事，我要遭遇种种突破个人认知和个人经验的事物的“入侵”，这些“事物”，就像拉康说的“实在界(The Real)”，它构成了伤害性，但

它才是某种真相的代言人，正是它们运作在社会身体的深处，组成我们所处世界的内部“骨骼”，要想突破这副骨骼，何其之难！

所幸我发现，已有许多非医学领域的人文学者，关注到了人们所遭遇的医疗困境。比如台湾已故学者余德慧，在十五年前便提出了“人文临床”倡议：“能否将人文学科带进我们的受苦之处，在那儿，人文学科能否舍弃它的书斋传统，直视乃至投入受苦现场？”余先生认为，这是一种“广义的临床”。将宗教学、人类学、人文学、心理学等社会科学，甚至文学、艺术与哲学，介入受苦者的现场，正如日本学者鹤田清一所认为的那样，“临床”的希腊文原意是“在(病)床边”，即让哲学返回到受苦之处去成长起来，使其成为一门适应当下社会背景的新哲学，而不是仅仅将传统哲学用作受苦处境的某种纾解。

人们一定会关心，人文学科如何能够有效缓解受苦的折磨？罹患过重症的哲学家S.Kay Toombs的话，像是在回答这个发问，他说：“对最重要的伦理问题进行开放而贴心的对话，(受苦的)人们会将注意力从世间纠缠难

解的事情上转向，去到内心最深的情感处，从而体会到，什么才是自己的终极意义。”

因而，“开放而贴心的对话”“追寻意义”等，是医疗之外的、病房里至关重要的事物。在这苦痛的现场，各类人文精神是能够以综合搭配的方式开展行动的。比如，文学可以协助苦难者以叙说的方式怡情，宗教可以成为受苦者的抚慰，哲学以其特有的分析、诠释和超越观，可以让人厘清自己因痛苦而纷乱的内心……这些，都有助于转移人们身体上的苦楚，让“受苦”变得能够疏解。

我出院后，好友思安安慰我：经此一役，万事顺意。我感慨道：我说在病房之外，我对苦痛的观察是一种从上往下看的方式，而躺在病房中，则变成了从下往上看的方式。只可惜这些思索，是在我出院后才厘清的，它没能帮助我对18床在日常情谊之外实践得更多。除了琐碎对话的聊以慰藉，除了我曾邀她共享一次鱼汤，熟悉精神分析的我，在她遭遇苦楚，情绪低迷的时候，本应多做点什么。

由此，我也萌生出对社会系统的期盼：是时候将人文关怀引入病房中了！虽然，这不但要求践行者能够对受苦的处境给予多层面的思考，包括命运、生存、情绪、人情世故、事件逻辑，甚至包括身体的感知与觉察……诸此种种皆不易，需要行动的勇气，更需要行动中的智慧。而在这理想的愿景得以实现之前，我怀着朴素的心愿：在苦痛的现场，人与人的相遇之处皆能温暖以待。温暖，即是一种最基础的疗愈。

今天太阳很好，阳台上很暖。看着这盆琴叶榕，忽然动了写它的念头。

什么东西，相伴久了，即便再不重要，也有了意义。时间最为无情，但又最富感情。似无意间，这盆花已经伴我二十一年了。从三根筷子似的枝丫，长成胳膊粗挺立的三杆，个子早达三米以上，俨然一株树了。搬入新居时不得已给它剃了头。

2002年冬，我从济南到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工作。打开分配给我的办公室，就见茶几上摆着一盆盛开的蝴蝶兰，办事员告诉我，是朋友托人送来的。花冠上有卡片，原来是刘国瑞先生送的。刘先生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首任总经理，出版前辈，葆有古风。我因工作与他相识，其实并不熟络。这盆蝴蝶兰开了两个月，使我初入陌生的环境就感到温暖。转过年来开春，“非典”即将暴发之时，发行部的叶芳让苑爱国去花市买了几盆绿植，每盆十元左右，给了我一盆。花盆是简易白塑料桶，二三十厘米高，放在南窗台上，虽显小气，枝叶映着太阳，倒也绿得好看。不过，很快就忙起来了，这株小绿植的存在，完全被我忽视，它属什么科，木本还是草本，叫什么名都没问过。隔几天有打扫卫生的工人给它浇水。

叶芳是嘉兴女子，模样娟秀，性格急躁，眼里不容沙子。相识多年，一不小心成了她的领导。她是业界名人，爱书懂书，有才而又敬业，本领导干脆幕后，任她发挥所长。惜她两三年后调离……就这样，九年过去了，我在三联做了不少事，出了不少书，交了不亦乐乎，原望终归于未，未想调去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。搬家时，同事问我，这绿植不值钱，你到那儿可以买盆好花，不必带走它吧。我才发现，它已经长得很高，枝干比手指粗了，花叶则遮满半个窗。塑料花盆还没换，但连盆放在一个稍大的棕色陶桶里。忽然觉得必须把它带走。因为太高，是让它横躺在车里来到北总布胡同新办公室的，仍放南窗台上。

于是有心上网查了一下，它的名字倒很雅致：琴叶榕。原是美洲植物，越南、中国也算产地，主要生活在南方

热带地区。琴叶，据说是因为叶子像小提琴；榕，指常绿乔木。的确，无论冬夏，总是绿的。它属木本植物。小枝条附着短柔毛，叶片厚，全株含有乳汁，俗称为奶汁树。花朵为椭圆形，果实为鲜红色，椭圆形或球形。花期为6月到8月。喜温暖、湿润、微酸性土壤和阳光充足环境，耐湿耐旱，对干燥空气耐受力强。它还是一味中药，具有祛风湿、解酒消肿、活血通经功效……我才知道，原来它还会开花结果啊！对这要弄明白——九年之久，怎么从未见到？

像在三联一样，办公桌南北靠窗横放，我坐东朝西，琴叶榕就在我左前方的窗台上。渐渐对它有了兴趣，然而有点不满：三根枝干光秃秃直向上长，顶着个绿叶帽子，造型呆板、难看。正这样琢磨着，某日忽就发现，在我认为最该分叉的地方，竟然冒出新芽！起初是两瓣叶子，随后鼓出了枝杈。我很惊讶，专门在便签上画了幅写生钢笔画，记下它的善解人意，并注明时间：2012年5月7日——可惜手艺丢下多年，画得并不如意。这张便签夹在笔记本里，保存至今。

不久，办公室迁到双井富力中心十八楼。室域较大，有落地窗，让它立在窗前地板上，阳光普照，绰绰有余，形如起舞女孩。先是，请工人把塑料盆除去，在原有外层陶桶中加了新土。许是光照水土充足，根须自由伸展，它像拔葱一样长大、长高，叶片日益蓬密，厚、深而绿，不过三个月，完全是成年汉子了。一日，女工说，楼下过道里有一度弃瓷缸，可以把它移植，不然太身小，容易歪倒。我很感谢这位女工。瓷缸白地蓝花，喇叭口，直径约六七厘米，样貌不俗，不知为何被人遗弃。装满新土，两个壮汉才抬得来。随后三年，是

难忘的书与人

琴叶榕

汪家明

琴叶榕成长最快的日子。四散分叉的新枝条尚软，巨大的绿叶压得它们轻弯着腰，有一点风，就晃个不停。同事进了我的办公室，都会因它注目，说：气真旺！或说：怎么长这么好！

在人民美术出版社那几年，是我出版生涯最后的狂欢。编辑出版《小艾，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！》，十卷本《榭榭楼集》，六十卷本《中国美术全集》(普及版)，四卷本《张光宇集》以及“经典连环画原稿原寸系列”五种，《极简中国书法史》《沈鹏谈书法》……中午饭后小憩，我会拖把椅子，坐它旁边，观看窗外蓝天飞鸟；晚上加班看稿，四下阒寂，偶然抬头，无声的它站在那里，不知从何处照进来的光，把它的影子拖得好好。

2015年我退休了，它随我迁到北四环外嘉铭桐城社区的家里。我住在这里十多年了，是朋友徐城北介绍我来的，说是北京太大，有个朋友住邻居才好。我亦同感。房子样式较老，阳台有一米多高的水泥围挡，琴叶榕个子高，只好放在地上，如此，它的下半身就一直处在阴暗中了。好在它并不挑剔，仍旧蓬勃勃勃地长，过几个月就要给它剃一次头。浇水的事自然落在我身上了，一周或半月浇一次。有时事多忘了，二十三天浇一次的也有。我对它的关注并未因此增加，因为虽然从单位退了，还在做一些出书的事，并翻出尘封多年的文稿，编辑自己的文集；最紧迫的，我想写一本《范用传》。2023年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，希望那时能在三联书店出版。要查许多资料，尤其是别人未知的新闻资料。

徐城北和他的夫人叶稚珊都是文章高手。城北兄是名人之后，父亲徐盈、母亲彭子冈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名记者，城北兄家学渊源，研究戏剧，但勤于写散文，曾有豪情，要全国大城市的上百家报纸副刊都有他的文章发表。叶稚珊则是公认的才女，张中行、冯宗璞、费孝通、叶至善等文化大家都喜欢她的文章。他俩曾是我的许多作者和选题。我两家楼栋斜对着，他们在十一楼，我在五楼，从他们家阳台可以下窥我家阳台，最好的标志物就是占了半壁阳台窗户的这株琴叶榕。叶稚珊心灵手巧，每逢腊月，会培养好多盆水仙，送给朋友。我每得到馈赠，春节盛开，绿叶白花，香气清雅。可惜城北兄晚年中风，叶稚珊精心侍候多年。他曾对我说，叶稚珊是我的菩萨。2021年，疫情期间，城北兄仙逝，享年七十九(他是10月份生，10月份去)。2020年我为家里老人，搬家到东四环外十里堡社区，城北兄的丧仪因疫情未能参加……

十里堡新家阳台的封窗是落地的，琴叶榕又可以全身沐浴天光了。我没再深究它为何不开花，甚至觉得无花更好。送我琴叶榕的叶芳，早已随女儿去了美国，偶尔回来，几位三联书店的老同事去朝阳门外大街的常州宾馆餐厅聚一聚。平日在网上也有联系，但很少。二十一年，会改变很多事情的。

2024年10月 北京十里堡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